



尼 克 索 評 傳

克雷莫娃 涅烏斯特羅耶夫著

尼 克 索 評 傳

克雷莫娃 涅烏斯特罗耶夫著

楊 霞 華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Н. И. КРЫМОВА, В. И. ЦЕУСТРОЕ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АРИНА АНДЕРСЕНА НЕКСЕ

本文原名“馬丁·安德遜·尼克索的生平和
創作”，係俄譯“尼克索選集”的序言，根據

МАРИН АНДЕРСЕН НЕКС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ОМ I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1) 譯出。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大街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67 号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 504 字數 28,00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frac{5}{16}$ 插頁 2

195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50,100 册

定價(7) 0.18 元

当代丹麦最卓越的作家，爭取各民族和平、進步和自由的積極战士馬丁·安德遜·尼克索的名字，在全世界享有份所应得的爱戴和光荣。尼克索对苏联人民特別親切，一种長期的、堅固的友誼，把这位丹麦的革命作家，这位“斯堪的納維亞的高尔基”，和苏联人民親密地結合在一起。在一九四九年，苏联各个社会团体廣泛地慶祝了这位作家的八十誕辰，尼克索認為，他能成为偉大的俄罗斯人民的“义兒”是他一生的幸福。“我的精力虽然已經衰竭，”尼克索在莫斯科举行慶祝会的那一天說，“可是当我被邀請到這裏，到苏联來的時候，我还是來了。因为这是母親的召喚啊。”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認為他自己作为一个藝術家的任务，就是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作人類的先鋒，也就是說要完全站在苏联这一方面，積極参加为实现共產主义的光輝理想的鬥爭。億万人民，尼克索說，“为了要勞動，为了要獲得快樂，为了要使生活变得美好，”最

需要的就是和平、尼克索在自己的社会活動和文学活動中，是作为一个为人民的利益而鬥爭的战士出現的。他一步一步地揭穿帝國主义者以及他們的伪裝为社会主义者的奴僕們的种种反動陰謀。

丹麥以及國際的反動势力不断对尼克索進行迫害，然而他却始終是一个为人民的利益而鬥爭的坚定不移的战士。他和丹麥人民一起，在共產党的領導下，为祖國的獨立而鬥爭着。

丹麥人民日益深信，赫托夫的“社会民主”政府所奉行的充当美帝國主义帮兇的政策是会招致滅亡的，現在他們正在右翼社会民主黨員的積極支持下組織資產階級联合政府。丹麥人民已經認識到，真理是在組織为爭取和平和進步而進行的鬥爭的共產党这一方面。一九五〇年六月丹麥共產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決議中寫道：“在战争準備日益加緊的同時，各國人民反对战争和軍國主义化的自覺的鬥爭也日益加强了……我們共產党人欢迎这一个不分政治及宗教信仰，包括所有社会階層的和平鬥爭陣線。同時我們熱烈地号召所有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人們來支援和平及和平合作的力量。空前未有的經濟重軛正压在勞動者的肩上。只要取得战争所需要的經費，可以不顧社会發展的陷於停頓，文化水平的日益降低。科学的使命是促進人類的福利、進步和幸福，但是科学家却被迫去發明各种殺人的工具。‘馬歇爾計劃’和‘北

大西洋公約’使得民族獨立和民族自主成為一句空話。”在今天，反對戰爭的鬥爭“不僅是丹麥獲致和平和自主的前提，而且也是建立較高的社會和文化水平的條件。這樣的鬥爭是保證和發展民主政治所不可缺少的。”

丹麥無產階級文學的創始人尼克索的一生和他的創作，是與人民的利益和鬥爭，與工人運動，有着緊密的聯系的。

2

後來以筆名尼克索著名的馬丁·安德遜，於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誕生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郊外的一個工人住區裏。他的父親漢斯·約爾金·安德遜是一個石工，出生在一個叫做蓬霍爾姆的遙遠的島嶼上。他的母親瑪基里達·瑪英芝是墨恩島一個鐵匠的女兒。

一八六四年以丹麥的失敗而告終的丹麥與普魯士的戰爭所引起的艱難的經濟情況，首先影響到了無產階級。這位作家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就是在一種艱難的經濟情況以及工人運動日益開展的形勢下度過的。

尼克索很早就認識了無產階級生活上的各種艱難困苦，這在他的世界觀的形成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所接觸的人多半是工人和貧苦的農民。對於這一些人，他們自己的勞動就是生活的唯一的來源。馬丁·安德遜從

小就看到父親在採石場上或者在桥梁建築工地上的艰苦工作，以及母親的超人的自我犧牲精神。在無產者的隊伍裏，一个人的好坏是根据勞動質量評定的，因此在这种环境中教养長大的馬丁·安德遜，也像其他無產階級的孩子一样，很小的時候就不得不做工了。形成他早年对生活的观念的环境是複雜而且充滿了矛盾的。在貧農中間，还存在着与“惡劣的時代”和“环境”鬥爭是不可能的那种小市民的觀念。可是他父親和哥哥喬治想投入反对社会不平現象的鬥爭中去的願望，對於馬丁·安德遜是親切而且容易理解的。

稍後，關於自己一生中这一段時期，尼克索寫道：“我不但有了判断自己的生活方向的能力，同时还產生了对未來的概念。”这种概念不是單純的關於“明天”的憧憬，因为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而社会生活却没有絲毫改变。真正的“明天”从來不会自行到來，公平的社会必須用鬥爭來爭取。

偶然得到的一些帶有宗教性內容或者冒險性的書籍，自然不能为这个少年解答那些激動着他內心的問題；相反地，只有使他的意識更模糊。最初給予尼克索以丰富的思想材料的文藝作品，是古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著名的同國人漢斯·克里史吉恩·安徒生的尖銳的社会性的童話。

馬丁·安德遜在貧民学校裏的學習——最初在首

都，後來由於家庭遷居蓬霍爾姆島，轉往尼克索城就學——並未得到他所希望的結果，因為丹麥的學校，遠遠落後於當代進步的社會任務。為了要做工謀生，尼克索很早就輟學了。對他來說，真正的學校是生活，特別是從他跟隨父兄在“地獄崗”的採石場上工作的那個時候開始的生活。

在蓬霍爾姆島上，馬丁·安德遜經常接觸到的是大海、暴風雨、覆船的消息，以及水手的艱酷的生活等等有趣而不安靜的事物。在喬治和馬丁看來，水手們的暴動，是他們爭取本身權利的極自然的表現。

在島上，尼克索家庭的生活條件，並沒有改善。尼克索後來寫道，在這裏，安德遜家到了“另一個世界上，這一個世界，比起他們所離開的世界要落後整整一個世紀”。社會關係在表面上虽然是簡單的，宗法式的，但恰恰就在這私有財產觀念很強的農民中間，馬丁·安德遜看到了私有農民對待僱工所採取的惡劣態度，尤其是对待被蓬霍爾姆本地人稱呼為“外邦人”的遷移來的瑞典僱農。他們只不过是出賣的“廉價勞動力”而已。然而，正像在丹麥全國一樣，蓬霍爾姆的農民不全是一模一樣的，與大農莊主對立的，不但有外國工人，而且也有丹麥的僱農和貧農。

馬丁·安德遜在他當僱農的青年時代，特別清楚地感到了階級不平等的意義。早在這個時候，他就對商人

和富有的地主恨入骨髓了，因为工人们变成了这些地主的“囊中物”。“在外人中间”所过的生活，成了尼克索的嚴酷的實踐學校，所以在这个青年的心中，產生了对那些殘酷的主人以及对那些为僱農設下的“地獄般的生活条件”的憎恨。其他的僱農都說，安德遜已經成为“自由思想者”了。可是他明白，只有在成为城市工人之後，反对剝削者，和爭取被压迫者的权利的理想才能实现。一八八四年，他遷居到萊納城後，就为这个理想的实现打下了基礎。

馬丁·安德遜在皮鞋店裏的“学徒生活”，对他來說是一个嚴酷的生活考驗時期。就在这一个時期，以及後來在高等國民學校裏的幾年內，馬丁·安德遜開始对許多社会生活問題有了更明確的理解。这个青年从爱好閱讀書籍的皮鞋匠安德萊斯那裏，从新聞記者耶高巴·漢新那裏，後來又直接从工人那裏，听到了社会主义的理論。同時，他也開始認識各种各样的資產階級自由主义學說的賣國性質，因为他們歪曲了科学社会主义。

由埃斯吉爾馬里和阿斯高夫幾所高等國民學校的一些听講者和進步教授所發起的學術辯論會，給了馬丁·安德遜以丰富的思考材料。当地工人小組的代表們，也常常参加社会政治問題的討論。他們把尖銳的政治問題拿到會上討論，發現了自然發展及社会發展过程的唯物觀點。

在木匠蒙克的工人小組裏，討論的是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問題——關於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日的問題，關於罷工運動的目的和形式的問題。馬丁·安德遜從蒙克那裏知道了妥協主義者的學說的政治意義。這一些妥協主義者，按小組領導人的生動的說法，是在工人鼻子上戴一副綠色眼鏡，要他們吃着飽花，而假想自己是在吃涼拌菜。於是這位未來的作家就日益確信工人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而鬥爭的堅決性；對於工人問題的討論使他產生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自己不斷成長的感覺”。

在他的觀念中，藝術和文學也不是與社會生活隔離的。尼克索勇敢地反對資產階級文學上的反現實主義的傾向，並且確定了為現實主義鬥爭的必要性。與在農民高等學校裏佔優勢的哲學家尼古拉·格龍特維克的宗教思想和小市民妥協哲學的原則相反，馬丁·安德遜認為歷史的原動力是在人民中間，在革命鬥爭中間。

席捲丹麥資產階級各個不同的文化領域的格龍特維克運動，完全是一種使基督教教義適合於國內資本主義發展的任務的嘗試，這在一些專門學校培養未來的地主——他們自命為“國家的中堅”——的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格龍特維克的信徒們企圖證明，由於丹麥的歷史發展的特殊條件，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似乎不是丹麥所固有的。關於這一點，尼克索一九三九年在他的中篇小說“旅途的終點”裏寫道：“正是在這裏，在阿斯高夫的學

校裏，人們在理論上對格龍特維克關於民族大團結的驕傲的思想，戀戀不捨，大肆頌揚。但事實上這個團結是有限度的。”

尼克索在擔任國民學校教師以及後來成為職業作家後，就開始把這個被資產階級辯護者們繼續描繪成“理想國度”裏的社會政治局勢，以及階級鬥爭的意義向丹麥勞動人民進行解釋。馬丁·安德遜·尼克索在這方面的創作是列寧的名著“土地問題與‘馬克思的批判’”（一九〇一——一九〇七年）的極好的藝術說明。列寧這部著作，一方面證明了許多物質財富都高度地集中在丹麥大畜牧家和大地主手中，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丹麥小農的極端貧窮。因此，根本就談不上什麼“農業國”的任何一條特別發展的道路，也談不上它內部的階級矛盾的調和。大規模的農業生產的繁榮，對於一些無馬匹和耕牛的農戶，就是必然的滅亡，而對於貧農本身，用列寧的話說，就必須尋找“副業”，也就是說，“不管怎樣，要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①

3

一八九三年到一八九四年之間，尼克索開始了文學

①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三卷第一八六頁。——原註，

活動，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浪漫詩集。這些詩篇是他由於一些非常偶然的動機寫成的。只有在短篇小說“與死亡決鬥”、“買彩票的瑞典人”和其它短篇小說裏，這一位把向千百萬讀者說出生活的真理看作自己的社會職責的作家，才明顯地確定了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輪廓。

作家為了治病，靠着朋友們湊聚的資金，在一八九四到一八九六年間，遊歷了意大利和西班牙。他那些刊登在丹麥定期刊物上的“南方”旅行印象記及短篇小說，與那些描寫丹麥生活的現實主義的短篇小說，組成了他的最初幾部政論文集及短篇小說集。

尼克索在與那些要求作家描寫“非常的环境”，描寫“未曾有過的”東西，而且責難“描寫日常生活的文學”的頹廢派的批評所進行的鬥爭中，堅持必須真實地反映現實。在“陰影”（一八九八年）裏，在“田鼠的土丘”（一九〇〇年初版）裏，在“晴朗的日子”（一九〇三年）裏，在“我童年的海濱”（一九一一年）裏，以及其它集子裏，作家敘述了工人和農民的命運，敘述了那些失業的並且往往是無家可歸的貧農的生活。他們被熔鑄在一些概括性的形象——“空座上的旅客”中。

尼克索描繪了一定社會情況下的“旅客”的形象。他清楚地看到了迫使那些失業的、無車票的旅客漂泊到遠方去找尋工作的原因。後來他描寫他們：“我早就注意到了那些空着的座位，現在它們重又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我看見了所有那些沒有坐在這些座位上面的人：空座位上的旅客。從那個時候起，他們就以只有在貧農身上才会有那種忠誠追隨着我……誰看見那些空着的座位，誰就活該倒霉，從此就不能安寧了。他會深深地感到痛苦，因為他到處都看得見它們，因為全世界都佈滿着空的座位。”這樣，尼克索就確定了他的美学的社會任務：不僅要表現這種“旅客”的形象和命運的典型性，而且要參加到為爭取他們的利益的鬥爭中去，因為他認為，無產階級的藝術家應該和人民取得密切的聯繫，和他們同甘共苦。

誠然，在他早期的短篇和中篇小說裏（“用生命作代價”——一八九九年；“母親”——一九〇〇年；“法朗克一家”——一九〇一年；“塵”——一九〇二年，以及其它），仍然存有自然主義的烙印。自然主義在十九世紀末葉在丹麥文學中流行很廣，特別是在實驗主義批評家喬治·勃蘭提斯的理論著作和小說家揚斯·耶考勃遜的創作中，以及部分地在小說家亨利克·龐安辟丹等人的作品中。尼克索在他的許多作品裏，極其詳盡地描寫了丹麥的工人和貧農的艱苦而且似乎毫無出路的生活狀況。他把勞動人民的種種苦難，往往用偶然的原因來解釋，譬如說，他把那似乎是很難以抗爭、甚至是不可能與之抗爭的酗酒，就認為是偶然的原因之一。作家一時還只能描寫一些孤立的事實，只能寫出那些在這樣的環境中可能產生的原因。但重要的是，即使在尼克索的早期作品

中，现实主义的原則也仍然佔着优势，後來則更把自然主义的因素排挤得一乾二淨。

作家收入第一个集子“陰影”裏的“臨死的鬥爭”、“兩兄弟”和“買彩票的瑞典人”等短篇小說揭示而且概括了丹麥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作者大胆地揭露了庸人們精神上的墮落，小市民的無气節，傳教士及宗教信徒們的教義的有害影响。在“買彩票的瑞典人”這篇小說裏，作者描寫了一个石工的悲慘的歷史；这在許多地方，很像是作者的父親漢斯·約尔金的傳記。一个資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瑞典工人的故事的客觀意义，在極其深刻的生活矛盾中被揭示出來。故事的主角是許多無產者中間的一个，是許多被剝削和顛沛無告的人們的一个代表。对他來說，單槍匹馬的鬥爭是無力勝任的。按照尼克索自己的評断，在这个短篇小說裏，他在“心理上的論証和材料的整理上”頗为成功。

短篇小說“麵包”、“馬奴爱拉”、“妇女革命”是反映作者在兩次到南方去的夏季旅行中所熟識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人民的生活的作品。跟那些只描寫羅馬、那不勒斯以及其它城市的美麗，或者創造一些關於南國的浪漫傳說，把这些國度描寫成“万事大吉”的福地的資產階級作家們相反，尼克索描繪了正在進行鬥爭的人民的嚴肅的面貌，真實地顯示出了种种对立的社會現象——失業者的痛苦，貧農們的破瓦殘屋与一小撮富豪的高樓大廈。在一

个名叫拉法爱尔的主人公的命运裏，作者寫出了一个貧農的悲慘的生涯，这段生涯与“買彩票的瑞典人”的命运相類似：他相信在与环境的殘酷的搏鬥中，他会“獲勝”，可是他却在警察的木棍下倒下了。

在尼克索略帶陰鬱色彩的早期短篇小說中，“妇女革命”是一篇完全不同的作品。在这篇小說裏，作者肯定了革命鬥爭的必要性。这篇小說暴露了西班牙無產者艰苦的生活条件怎样迫使他們放棄了天真的想法，描寫了他們內心的憤怒怎样沸騰起來，和他們怎样開始为爭取自己的階級利益而進行積極的鬥爭。

特寫和短篇小說集“晴朗的日子”極其自然地繼續描寫了西班牙人民的生活情况。在“在旅途中”、“直布罗陀”、“塞維里亞”、“高尔陀巴”等特寫中，尼克索寫了許多關於人民生活的插曲，把它們描繪成歷史过程中概括的典型的事实。作者特別詳細地描寫了直布罗陀、丹吉尔和其它港口裏的居民的状况，这一些港口被外國人，主要是被英帝國主义者变成了半殖民地領土。同時，在这个集子的一些特寫和短篇小說裏，作者也追溯了奋起反抗殖民政策的勞動羣众的革命意識的成長过程。尼克索不只是用“隨時準備起义”的雪茄烟廠女工們的例子來說明这个过程，而且把它看作是一樁对全國具有典型意义的現象，因为照他的判断，在每一个誠实的西班牙人的意識裏，“都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挽救國家的唯一

道路就是革命”。

最初收在“田鼠的土丘”裏，後來又編入別的集子裏的一些短篇小說，是尼克索在國際工人運動高漲，進步勢力反對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反對在發展中的沙文主義和右翼社會民主黨首領們的叛國活動的鬥爭日益加強的形勢下創作的。在這些年代裏，尼克索本人親身熟悉了許多國家的社會生活。在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八年之間，他曾三次到德國去旅行，在一九〇七年又到俄羅斯，一九〇八年又到蘇格蘭等國家。在發表於一九〇五年論述俄羅斯革命事變的“紅旗”這篇論文裏，他着重指出了這次事變的國際意義，並且評論說，警察反動勢力對革命者的迫害和暴行，只是証明了俄羅斯沙皇制度政治上的軟弱無能，同時，在另一方面，也証明了那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力量的人民，已不願再按照舊的方式生活下去了。

尼克索把在這些年代裏寫的短篇小說——包括那些具有自傳性質的故事在內——按照社會特徵分出類來，分別稱為無產階級短篇小說、農民短篇小說和海員短篇小說。這些小說儘管在主題上有着區別，但在許多特徵上，仍舊是類似的。它們的敘述體裁像政論一樣尖銳，從革命的無產階級立場上來反映生活。其中有許多篇在形式上接近民間傳說，在這裏面的象徵性的圖畫和形象，具有重大的意義。這些小說裏的無產者，往往很像丹麥民間故事裏的英雄彼爾·高略克。作者常常把貧農彼爾的形

象寫入故事裏，使他積極參加各个事变，从而着重指出人民的宿願是有可能實現的：人民在万能的巨人彼尔·高略克的帮助下，一定会戰勝黑暗勢力，獲得公平的生活。

在“死亡”这一篇短篇小說裏，作者寫出了貧農格琪翁光輝燦爛的一生：他“以巧計戰勝了死亡”，看見了革命变变的“創造奇蹟的浪潮”流到了小小的丹麥，迫使老百姓不得不“觀察一下自己周圍的事物”。尼克索寫道，“死亡已不能再像从前一样統治着他們的小天地了；人民在感覺到地面上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存在之後，就把自己的兴趣轉移到生活中去了……彼尔·高略克把黑暗的帷幕撕破，準備改造世界”。短篇小說“牆壁”、“爱的孩子”、“自由小仙人”，也証明了勞動者不願意繼續过牛馬的生活。

尼克索的描寫農民和描寫海員的短篇小說，也像描寫工人的短篇小說一样，是用主人公的傳記形式寫成的。在这些小說裏，他描寫了數十年內農民生活的狀況（“餘孽”）；顯示了一八六四年戰爭的後果（“殘廢者”）；論述了農村裏和海軍裏的尖銳的社會分化的原因（“換班人”、“墳墓”、“老海員”等）。

当尼克索轉過來直接描寫守財奴的世界（“罪人”、“彼得叔叔的錢財”）時，他在短篇和中篇小說裏對資產階級現實的批評，就具有了鮮明的諷刺色彩。作者揭露了小市民習氣對一般人的影响（“候鳥”），也談到“听天由命”的哲学對他們所起的有害影响（“白痴”）。在短篇小說“一